

论我国大众英语的意义

胡荣生¹, 张思武²

(1.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2. 四川师范大学 社科学报编辑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英语在我国大众化符合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英语大众化,有助于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改善我国发展的软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软实力。英语在我国的大众化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化服务产业竞争,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整体英语水平较低,英语大众化在我国最终发展成第二语言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大众英语;第二语言;文化战略;服务经济;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075-07

我国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以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大事件为契机,英语开始在我国大众化。对此现象,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英语教学界人士持有不同态度,或肯定,或否定,或困惑,或质疑。据“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2004年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出席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发表的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媒体上迅即刊发了群众的意见”[1]。该电所称“具体问题”中首当其冲者,就是在我国出现的英语大众化趋势。有人“对当前英语教育全民化的倾向……甚为忧虑”[2]。本文拟从实施文化战略和发展服务经济两个方面讨论大众英语在我国的意义。本文使用的“大众英语”,指包括学历课程和非学历课程的一切机构的和个人的英语学习以及任何场合、任何程度的一切机构的和个人的英语运用。

一 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英语在我国越来越大众

化,主要表现在学习、运用和教育市场三个方面。

在学习方面,小学逐步将英语纳入学历课程,中学将英语列为主要课程之一,中考、高考都将英语规定为主要考核科目之一。各高校一直重视大学英语(非英语专业)教学——其大学英语考级成绩十分重要:对学校而言在高校相互竞争中具有可比性,对学生而言是决定能否获得学位、找到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完成学历课程以后,英语学习并没有结束,至少对专业技术人员是这样。自从1980年代以来,职称英语(以及其它语种但以英语为主)考核就一直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各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先决条件之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英语学习不再局限于学历课程或职称评定。非学历课程或职称英语的英语学习主要有两类,一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的非功利性的学习,一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的学习。(当然,功利目的的学习也能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而非功利性的学习成果也可以用于功利目的。)在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成

收稿日期:2004-05-25

作者简介:胡荣生(1948—),男,四川成都人,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张思武(1949—),男,四川叙永人,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硕士(英美文学),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文学硕士(TESOL),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哲学博士生(CIMT)。

功之前,准确地说是国际奥委会最终确定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一年多之前,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8月发起大规模的英语学习群众运动,旨在占全市人口50%的数百万市民学说100句英语,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3]。北京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及广大市民纷纷参与,形成大众英语学习热潮。在申办世界博览会的上海市,也曾出现类似的大众英语学习热潮。

在运用方面,英语不再只是英语从业人员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以汉语为母语者愿意并且能够用英语进行交流,用英语表达或理解,用英语进行口头或笔头的交际。以前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英语,现在已经渗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场所的标识、标语到广告,从报纸、期刊到图书,从广播、电视到电影,无处没有英语。只要能够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的地方,无论多么偏远,无论多么落后,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都可以看到CCTV甚至可以知道CCTV是什么意思。中央电视台除第9套节目即英语频道以外,其他频道也播放英语教学以外的英语节目,如新闻报道、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人物访谈、英语原版电影电视等等。即使在西部城市,也可以听到公交乘务员或公车录音用汉英双语报站。在西部省会成都市的锦江区,由22名年轻巡警组成的首支英语巡警队已经正式开始汉英双语执勤[4]。WTO、GDP、MBA、China、USA、FBI、E-mail、Taxi、Bus、SARS、AIDS、McDonald's、Super Market、DVD、CD等等,早已为都市民众耳熟能详。APEC、OPEC、IMF、GSP、GMP、DFI、CAD、DSP、GPS、SUV、MPV、FIFA、NBA、CUBA、CSCCI、TOEFL、GRE、GPA等等在专业人员中不胫而走。许多重点高等院校在专业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虽然因为教师和学生双方英语水平的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毕竟坚冰已破,非英语专业学生开始使用引进的英语原版专业课教材。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各级各类英语教学机构蓬蓬勃勃。即使在西部地区,不但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开设普通英语专业和/或专门英语专业(如师范英语、旅游英语、外贸英语、商务英语、科技英语、外事英语等等),工科院校(如西南石油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农业院校(如西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医学院校(如重庆医科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专门院校也纷纷开设普通英语专业和/或

专门英语专业。西部省属重点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7个院系、二级学院(不包括其独立二级学院)设有包括普通英语和专门英语的7个英语专业,2004年计划招收英语专业新生共达1910人[5]。普通中等学校沾上外语就“火”。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西部省会城市成都,冠名“外语”的中等学校就有10余所。未能获准冠名外语的中等学校,则申报挂牌“英语教学基地”或开办各种“英语精品班”。甚至幼儿园也以英语或双语冠名。各地英语培训机构的学历课程英语班和非学历课程英语班更是不计其数。英语教育市场繁荣盖自民众需求旺盛也。

上述现象说明,英语开始在我国大众化,英语目前在我国处于十分有利的社会语言环境。

二 环境

社会语言环境对于英语作为一种外语在该社会的前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语言环境包括:外语与其它语言在家庭和社区的地位和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使用何种语言或要求不使用何种语言、外语与其它语言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得孰多孰少等等),民众接触外语与其它语言的机会和这种机会的性质(是否真实语境,是否真实材料,接触的广度、深度、频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等等),社会对外语和双语的价值取向(是否有必要学习和运用外语、是否有必要运用双语或者只使用第一语言就足够了、对学习和运用外语持积极或消极的态度等等),以及国家或地区对外语和双语采取的语言政策(通过决定教育机构的课程设计和考试科目体现的鼓励或限制外语学习运用的语言政策,尤其是由该政策决定的相关教育资源配置,以及该政策是否鼓励或限制外语在教育机构以外的学习运用等等)。

对于英语学习和运用而言,社会语言环境在两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导致学习者对英语的各种态度(家庭和社会是否支持学习英语、学习英语是否有前途有回报、周围有谁在学习英语或有谁不学英语等等),这些态度集中体现为学习动力,并与诸如年龄、个性、能力、前期知识等个人特征一起,决定学生如何利用社会所提供的学习运用机会;另一方面它决定学生能否得到各种正式的和/或非正式的英语学习运用机会(这些学习机会本身一经确定就成为社会语言环境的一部分)。而外语的学习结果和运用程度是由学习者与社会语言语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决定的[6]。

对于一种外语能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流行或大众化而言,社会语言环境从两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即国家或地区对外语和双语采取的语言政策,和社会对外语和双语的价值取向,其中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是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国家(而不是地区)的语言政策决定社会对一种外语的价值取向、决定在教育机构内和教育机构外对外语语种的要求和对外语程度的要求、决定相关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决定构成这种外语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的其他诸因素。国家的语言政策既是社会语言环境诸因素之一,又决定社会语言环境其他诸因素的产生、存在与性质。我国的国家语言政策曾导致1950年代的俄语热、1960年到1966年短期的俄语英语并重以及1966年以后长达近10年的对外语学习的消极或限制态度。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的积极的语言政策导致英语在我国的大众化趋势。今天,英语在我国如此大众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尽管英语没有被确认为我国的第二官方语言,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汉语的、使用人数最多的第二大语言(不包括各少数民族语言)。

因此,当我们听到关于大众英语的不同意见的时候,尤其是听到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于大众英语的反对意见的时候,感到有必要讨论大众英语的意义,希望这一讨论有助于公众对大众英语采取肯定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政府对大众英语采取积极的语言政策。

三 意义

有代表、委员质疑“全民英语”,提出英语应该“学多少,多少人应该学”英语的问题,认为“英语是一种语言工具……不应当普遍性地成为继续接受教育和人才使用的必要条件”[7];认为“英语教育全民化不能盲目提,应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需要、有条件地普及英语教育,比如深圳、上海等一些要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城市。但是欠发达地区用不上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8]。引起了“要把英语当成一种语言工具,还英语以本来面目”的共鸣[2]。这是对英语学习和运用的片面看法。

1. 文化战略

外语可以作为工具,但是不一定是工具。个人可以通过琴棋书画陶冶情操,同样也可以通过学习运用外语提高文化素养。毛泽东在1950年代学习

俄语,在1960年以后、1966年以前学习英语,与其说是为了掌握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为了提高文化素养。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讲英语,应该说是为了表现国家领导个人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文化素养。沙俄时代法语在俄国上流社会流行。对于俄国上流社会来说,法语同样并非一种工具,而是其文化素养的物化表现形式。我国用人机构招聘文员多要求大学(公共)英语四级,并非这些机构都需要运用英语,而是将英语水平作为考核应聘人员文化素养的尺度之一。外语不但可以作为工具,还是个人的文化素养的组成部分。有大学生“专业课成绩几乎全在80分以上,但惟独英语怎么也学不好”,研究生考不上,(学士)学位证拿不到,找工作有困难(用人单位要求英语四级),这只能说明这样的学生在外语素养方面尚不具备继续深造的条件,不具备学士学位资格要求的条件,不具备用人机构对文员要求的文化素养条件,在各方面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应该以此质疑“专业重要还是英语重要”[9]。既然明确英语“是全面素质教育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又认为英语“不应当普遍性地成为继续接受教育和人才使用的必要条件”呢?个人的外语素质是其文化素养的内容之一,文化素养又是全面素质的组成部分。“人文素养的培养比数理能力的培养更基础,因为人文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总支撑”[10]。北美美国、加拿大的教育机构虽然没有全国性的或全州/省性的统一课程设置规定,但不少小学、中学及多数大学都开设外语课程,最高学位哲学博士(Ph. D)的学位资格要求也包括一门外语和计算机读写能力(computer literacy)[11]。在以强势语言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美国,其它语种很少作为一种普遍工具(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除外),各级教育机构对外语的安排更多是出于培养人的文化素养的考虑,而个人的文化素养的高低则决定国家或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应该从培养国家或社会整体优秀文化素质的角度来审视我国的英语大众化现象,而不是仅仅把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培养国家或社会的优秀文化素质,亦即提升国家或社会在全球竞争中的软实力,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机构管理成本,改善中资和外资的投资软环境,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能否实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

直接影响我国的软实力。杨振宁认为,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中国[12]。对于杨的这一命题,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找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为之自豪的精华,有许多引起西方人羡慕的异彩,但是恰恰缺少适合并产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13]。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原本产生于西方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公平”、“公正”、“平等”、“正义”、“诚实”、“信用”等基本观念和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中很难找到。笔者以为,这就是“日益困扰着崛起的中国”的“文化缺失”[14]。西方文化是自律文化,遵从程序化的法规和权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功能职责的基础之上;而中国文化是他律文化(少数“君子”的自律并非普遍的自觉因而不能改变其“他律”的性质),遵从个人化的法规和权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个人感情为指向[15](66页)。例如,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都得“遵守游戏规则”(fair play),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谁不能“遵守游戏规则”,谁就没有“参赛资格”;谁违犯了“游戏规则”,谁就会被黄牌警告或被红牌罚下。不能遵守游戏规则却要追求“民主”、“自由”等,其结果只能是一切乱套,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杨振宁的命题,是中国文化不能适应源于西方文化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曹世潮认为,文化是“特定人群普遍自觉的观念和规则系统”,即特定人群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曹认为,“文化形成能力,能力决定经济”。曹认为,全球竞争的最后一幕是“文化战略的竞争”,“最终的竞争对手是文化对手”。曹提出实施文化战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未发挥的“文化能力优势”[16]。笔者十分赞成曹世潮提出的文化战略主张,但同时认为,仅仅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是不够的。为了应对全球文化战略竞争,我们不但要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使之发扬光大、古为今用,还应该学习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所有外国文化的精髓使之洋为中用,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或不利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缺陷。“在中国之外,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丰富得多……而大多数伟大的心灵,存在与我们所界定的中国文化之外”[17]。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精髓不可能只依靠翻译:翻译有量的问题,有质的问题,有时效的问题,更要紧的是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丢失问题。如关

于社会结构的“family”,关于社会生活的“politics”,关于立身处世的“politically correct”,人际关系中的“manners”,学校生活中的“teacher”等等,通过翻译一般只能传递表面对应的概念,而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却无法传递。笔者曾经亲闻一美国教授因一中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反复称其“teacher”而怒斥:“Don't teacher me!”这都是将“teacher”与汉语的“老师”对应等同所致。是为一例。

英语大众化,可以使大众在学习运用英语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成文的、明确的系统观念和规则,也可以使大众在学习运用英语的过程中默移潜化地接受西方文化中不成文的、暗示的基本观念和规则的熏陶。英语在我国大众化,可以促使中国文化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诸如“公平”、“诚信”、“遵守游戏规则”等基本观念,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的“自觉的观念和规则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发展的软环境。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软实力——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所相信的“同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18]。大众英语可以对我国的和平崛起产生间接的影响。

2. 服务经济

以英语是一种工具为出发点而质疑,“就我国现状来看,需要在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甚至高等教育完成后实际使用英语的人究竟有多少?”并认为“肯定有不少宝贵的人力、智力和财力被浪费掉了”[7],这是近视的观点。

曹世潮认为,“服务业将成为全球第一产业”[16]。事实上,服务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服务业已经占其总产值的60%,解决了美国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的就业问题,而制造业仅占其总产值的14%,仅能安排美国全部劳动力的11%就业[19]。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方面,服务业是制造业的4倍多;在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方面,服务业是制造业的6倍。这足以说明,服务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信息时代的服务产业,除了传统的服务业,还包括软件设计、IT服务、投资咨询、金融分析、税务服务、信息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质量服务等等,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

要求高。服务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有劳动密集(解决就业)、低投入、高回报、低能耗、高环保的优点,特别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我国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软着陆过程中调整了产业结构,但是与美国对比,我国服务经济仍然十分落后。最近6年中的1998年[20]、1999年[21]、2001年[22]、2002年[23]及2003年[24](国家统计局公报未提供2000年各产业增加值亿元数据)的5年平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高18个百分点;200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超过5年平均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28%,低于5年平均数,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高20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比美国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低27个百分点,而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美国第二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高37个百分点。这说明在服务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我国第三产业不仅在占GDP比重方面低于第二产业,而且在发展势头方面也不如第二产业。1998年至2003年的6年(包括2000年[25]),我国GDP平均增长7.88%,其中第二产业平均增长9.67%,超过GDP平均增长,而第三产业平均增长7.38%,低于GDP平均增长;这6年中,第二产业增长每年都高于同年GDP增长,而第三产业增长除1999年、2001年略高于同年GDP增长,其余4年均低于同年GDP增长;2003年GDP增长9.1%,第二产业增长12.5%,第三产业增长6.7%。这说明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在国家经济总体发展中滞后,也显示出我国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的空间和机会。

我国在开发服务市场方面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尤其是在开发全球服务市场方面。现在的形势是:机遇与挑战共存,挑战大于机遇,挑战来自印度。“如果说1990年代的全球化是以制造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第一波’的话,21世纪初期将迎来以服务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第二波’。”[19]在全球化“第一波”,我国抓住机遇,占尽先机,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2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的长期稳步增长的奇迹[26]。而在

全球化“第二波”,“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27],2003年4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赶上了中国”[28],在未来几十年中“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通过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而起家的发展中国家”[19],“成为‘世界办公室’”[29]。事实上,印度已经在开发全球服务市场方面领先我国,显示出“对中国的压倒优势”;现在,“美国各大跨国公司,离了印度人的后援服务几乎都无法运转”[19]。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同为世界人口大国。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两国的共同点,而印度在许多方面不如我国。印度的文盲占总人口三分之一,政局因为宗教冲突而不稳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0%,国民平均收入不过460美元,不及我国的三分之二[19]。存在这么多问题的印度何以能在开发全球服务市场方面领先我国,具有对我国的压倒优势?吉拉尔认为,“印度白领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将能使他们在众多办公室的工作中取代美国或欧洲同行”;第一大优势就是“他们会讲世界通用语言”,加上“他们可以接受的工资只有西方人的七分之一”这一劳动力便宜优势[29]。Kripalani等人将“英语的普及应用”列为印度在全球化“第二波”异军突起的主要条件[30]。耶鲁大学博士薛涌认为,“印度是个英语国家”,是形成印度在全球服务市场的竞争优势的几个原因之首,“这使之在占领国际服务市场上具有天然优势”[19]。“正是对这一优势垂涎已久,日本正企图把英语作为其第二官方语言。”[19]在这一场竞争中,我国的优势仅限于廉价劳动力,而印度的优势则是廉价劳动力加上大众英语,孰强孰弱,不言而喻。

我国能否抓住服务产业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这一极大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在我国的大众化程度。我国要参与服务产业国际竞争,成为“世界办公室”,实现全球化“第二波”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腾飞、又一个奇迹,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英语大众化。大众英语作为工具可以对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发挥直接的作用。

四 结论

大众英语在实施文化战略和发展服务经济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对英语大众化的质疑,为大众英语答辩。

“应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需要、有条件地普及英语教育,……但是欠发达地区用不上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如果全国人大代表的这一意见被采纳成为国家的语言政策,无疑只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事实上,无论从西部地区现实的英语运用还是从西部地区繁荣的英语市场来看,这一意见都是脱离实际的。

“有的同学四、六级都过了,但是仍然不会用英语”[8],这并不奇怪。即使是博士、教授,能将英语作为工具而运用自如的也为数不多,何况部分本科生呢?这是因为我国整体英语水平低,因而英语起点低。英语大众化本身就形成有利的社会语言环境,后者又有助于提高整体英语水平。有了英语的大众化,才会有英语的高起点。从另一角度来看,“群众意见”反应强烈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功不可没。1990年代以来英语四、六级的规范化、制度化,为英语在我国作为一种外语营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语言环境,使我国(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英语的高起点、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苦读一个不知何时才能用到的英语,原因在于职务、职称晋升的需要……英语水平高低已成为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门槛。”[8]职务、职称晋升

为什么需要英语呢?因为——正如代表、委员所指出的——英语“是全面素质教育中的一部分”[7],所以英语水平高低才成为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尺度。“不知何时才能用到的英语”,现在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而且这仅仅是英语大众化的开始。

英语在我国大众化符合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据专家估计,本世纪结束以前,世界6000至8000种语言中的至少一半甚至四分之三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三种最流行的语言之一——英语,西班牙语或汉语(普通话)[31]。另一趋势是从一种语言环境到另一种语言环境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加速,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越来越少的几种语言[32]。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全球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实际使用英语的人”绝不会仅限于部分“精英”或英语专业人员,所投入的“不少宝贵的人力、智力和财力”不会“被浪费掉”。“英语水平高低已成为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门槛”是完全必要的。

实施文化战略和发展服务经济都需要大众英语。为了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我国的和平崛起,有必要英语大众化并进一步使之最终成为我国的第二语言。这也是世界语言发展的大势所趋。英语大众化在我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展求真务实会风 两会代表、委员会上观点有交锋. <http://www.sdnews.com.cn> [2004-03-12,09:05].
- [2]蒋晨. 还英语教育本来面目[N]. 中国青年报, 2004-03-10.
- [3]Elisabeth Rosenthal. Beijing Dreams of 2008.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7, 2000. *A Quality Se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American & British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Zhou Xueyi (e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成都首支英语巡警队将亮相市中心繁华路段.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4-06/05/content_2257820.htm
- [5]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招生计划. 四川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印发. 参阅 <http://zjc.sicnu.edu.cn>.
- [6]张思武. Social-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9) (增刊).
- [7]张景勇,李柯勇. 谢克昌委员质疑现行英语教育[N]. 中国教育报, 2004-03-08.
- [8]教育体制遭质疑 学英语不该全民化. <http://www.edu.cn/20040310/3100855.shtml>
- [9]“强制英语”应予改革[N]. 新京报, 2004, 3, 8. <http://www.hubce.edu.cn/jwc/jwc5/messages/20743.html>
- [10]上官子木. 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基础[N]. 南方周末·视点, 2004-02-26.
- [11]笔者的朋友,全美学校律师委员会委员、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董事会律师 Joseph Russell 法学博士提供美国中小学情况,香港浸会大学杨素英哲学博士提供加拿大有关情况,谨表衷心感谢。
- [12]杨振宁评刘慧卿言论荒谬[N]. 太阳报, 2004-04-20. 参考消息·中国大地, 2004-04-21.
- [13]赵晓. 从市场伦理角度理解西方文明[N]. 南方周末·阅读, 2004-04-22.
- [14]杨中旭,冯亦斐.“和平崛起”引领中国未来[J]. 新闻周刊, 2004, (16).
- [15]参阅 B. Hall. High-Context Culture and Low-Context Cultur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hristine Bennet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 [16] 曹世潮,王丰. 下一轮全球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曹世潮王丰对话录)[N]. 南方周末·对话, 2004-01,-08.
- [17] 什么是大学的人文精神?[J]. 新闻周刊, 2003-10-03. <http://news.sina.com.cn/2003-10-03/10231857567.shtml>
- [18] 中国应该提升软实力(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访谈录)[N]. 亚洲周刊, 2004-05-02. 参考消息·海外视角, 2004-04-29.
- [19] 薛涌. 印度的挑战[N]. 南方周末·趋势, 2003-12-11.
- [20] 国家统计局. 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
- [21] 国家统计局. 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
- [22] 国家统计局. 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
- [23] 国家统计局. 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3.0228>.
- [24] 国家统计局. 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4.0226>.
- [25] 国家统计局. 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1.0331>.
- [26] 萨米纳 艾哈迈德. 表象的背后[N]. 经济学家周刊, 2004-03-20. 参考消息 海外视角, 2004-03-30.
- [27] 安迪·慕克吉. 印度: 是又一中国还是纸老虎?[N]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4-04-02. 参考消息 世界经济, 2004-04-11.
- [28] 印度正在抢中国的风头[N]. 华南早报(星期日), 2004-04-11. 参考消息·中国大地, 2004-04-21.
- [29] 雷诺·吉拉尔. 印度梦想成为“世界办公室”[N]. 费加罗报, 2004-03-03. 参考消息·世界经济, 2004-04-11.
- [30] Manjeet Kripalani, Pete Engardio, Steve Hamm. 印度的崛起. 商业周刊,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_p.php?BusinessweekID=207&Colum=封面文章.
- [31] S. Connor. Words are not enoug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05-29.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ELT curriculum. David Nuna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2001, (4).
- [32] David Nun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ELT curriculum.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2001, (4).

On Significance of Popular English in China

HU Rong-sheng¹, ZHANG Si-wu²

- (1.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4;
2.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N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Popular English in China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rend of world languages development. It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learn and absorb the quintessence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onduces to the soft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China's soft strength enhancement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t directly affects China's strength in global competition for service industry market and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 China to develop its currently insufficient inefficient popular English eventually into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popular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culture strategy; service economy; soft strength

[责任编辑:李大明]